



当代帝国主义如何征服人口？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口学分析

林进龙 穆光宗

[摘要] 一个缺少对人口进行安排和征服的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展开自身的。当代帝国主义不仅重新定义了“人口”，也改写了“征服”的意涵。对于传统帝国主义来说，“人口”是指与地理空间绑定的(比如一个国家或区域内的)所有居民；而对当代帝国主义来说，“人口”则是指以某种特征定义的、可以分化处置的个体集合，这种特征不限于地理空间属性。传统帝国主义的“征服”意味着占领、统治和剥削，通过直接“否定”殖民地人口的价值与意义来为自身辩解。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不仅包括否定和剥削，还包括“承认”，使被征服的人口自觉成为帝国主义运作的一部分。当代帝国主义的奥秘在于，通过隐蔽和复杂的手段，对不同特征的人口进行分化、控制和管理，潜在地征服每一个处在随机游走和历史张力中的个体，并能够自我强化和再生产权力结构的不平等。这种新型的政治人口学操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资本主义的崩溃过程。如果对帝国主义来说，“否定”对应的是“征服”和延续全球霸权；那么对马克思主义来说，“否定”则意味着“解放”和实现社会主义，而一旦实现了全部人口的解放，这种政治人口学运作也将走向消亡。

[关键词] 当代帝国主义；资本主义；人口；征服；马克思主义

在历史上，帝国主义与垄断资本主义瓜分世界的狂潮联系在一起，并以主权控制的方式实现对整个领土和人口的双重征服。正如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指出，在19世纪末的瓜分狂潮中，“英国夺得了37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5700万人口，法国36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3650万人口，德国100万平方英里的土地和1470万人口”（列宁，1990：391）。通过军事侵略和殖民统治，帝国主义国家不仅攫取了广袤的土地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财富，还将殖民地人口全面纳入其统治体系。这些人口被迫服务于殖民经济，成为廉价劳动力或市场扩张的对象，从而巩固和扩展了帝国主义的全球霸权，形成了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主导的世界体系。

传统帝国主义对人口的血腥和暴力的处置方式，使其容易被直接辨识并因此遭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当代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重大问题和影响研究”（22&ZD054）。

[作者简介] 林进龙，清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
穆光宗，北京大学人口研究所教授。

到强烈的批判和对抗。然而,随着传统帝国主义向当代帝国主义演变,原本清晰可见的“人口”概念在批判中逐渐隐退。针对“人口”这一线索的当代帝国主义批判,主要余下两种情况。一是将其夹带在政治经济学或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路径中,比如揭示当代帝国主义通过产业转移、跨国贸易和全球资本流动剥削第三世界劳工,以及通过掠夺自然资源和破坏生态环境,对发展中国家人口健康造成严重伤害(Avilés-Vázquez et al., 2023:427-448; Pitts, 2010)。二是关注对象从人口整体转向具体的群体(比如探讨移民政策和难民危机等议题),研究视角从宏观转向微观(比如探讨数字监控和生命政治等议题)。这一研究转向,在很大程度上取代了列宁等人在帝国主义批判中对“人口”这一整体概念和宏观研究层次的关注。然而,这些研究容易忽视这些群体和个体所处的更大系统和结构,从而导致无法全面理解当代帝国主义如何系统性地控制和利用人口。微观路径的分析还可能因为缺乏整体视角,使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批判力量被分散和削弱。

毫无疑问,一个缺少对人口进行安排和征服的帝国主义是不可能展开自身的。我们无法设想一个只有资本和自然界而没有人口的资本主义系统,更没有办法在这样一个无法运行的资本主义系统里刻画和讨论帝国主义;我们也无法设想一个满足于局部或碎片化人口征服图景的帝国主义,更不可能从一个非整体性的视角出发完成对当代帝国主义总体运作的全局考察。因此,系统性的人口路径分析对于揭示帝国主义如何通过对人口的整体安排和征服来维护其全球控制至关重要。基于此,本文旨在通过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政治人口学分析,揭示当代帝国主义如何通过微妙的运作机制获取展开自身的基础和辩护,并在扩大其影响力的过程中巧妙地掩盖对人口的控制、征服和利用。

一、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运作:理论分析与概念框架

(一)传统帝国主义与当代帝国主义征服人口的不同方式

传统帝国主义的出发点是将土地和人口整体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其关键特征是,人口与殖民地存在严格的空间绑定关系,帝国主义以全部占有的形式实现全面统治。人口与空间绑定(笔者将之称为“从地理进入人口”)的统治模式,之所以能构成传统帝国主义的典型特征,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这个时期“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马克思,恩格斯,2009a:52)。具体来说,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许多殖民地社会仍然处于封建主义或前资本主义阶段,殖民地人口主要由农民或土著民族组成。人身依附和地域区隔是这种社会形态的主要特征。物质生活和社会关系的地域狭隘性,使得帝国主义通过控制领土空间,实质上就掌控了生于斯、长于斯并依附在这片土地上的全部人口。这种严格的人口与空间绑定关系将当地人口全面纳入殖民统治体系,使得殖民地社会的个体难以逃脱帝国主

义的安排和征服。

起初,帝国主义的出发点是将土地和人口作为资本循环链条的轴承与齿轮,以此维系和扩大资本主义再生产。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看,“资产阶级历史时期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普遍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一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对自然力的科学支配”(马克思,恩格斯,2009b:691)。随着时间的推移,殖民地人口逐渐被卷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殖民地社会也经历了深刻的变革。在此过程中,现代科学、技术和贸易成为促使当地社会发生深刻革命的现实物质基础和推动力量。封闭、僵化、停滞的社会结构因此开始松动和转型,随着封建生产方式逐步瓦解及人身依附关系逐渐解除,社会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然而,毕竟资产阶级文明在其故乡与殖民地呈现的是两副截然相反的面孔。科学技术的进步、自由市场经济的发展和资产阶级人权与民主的推崇,在帝国主义国家被视为文明与进步的象征,但这一切是以资本主义扩张带来的剥削和不平等,以及殖民地人口的贫困和压迫为代价的。因而,任何一个生活在现代世界中的落后国家,作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对象,只有在彻底赢得民族自由、国家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基本前提下,才能获得参与世界历史的真正资格(刘敬东,王淑娟,2015)。20世纪中期,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许多国家通过民族解放运动纷纷实现独立,转变为现代民族国家,标志着传统帝国主义时代的终结。殖民地人口在民族解放运动中逐渐觉醒并争取自身权利的过程,被视为对帝国主义的一种集体抵抗。这种抵抗赋予了殖民地人口主体性意识,使他们在面对帝国主义时能够重新定义自己的身份并团结起来反抗暴力压迫。这意味着帝国主义“从地理进入人口”的殖民方式开始瓦解和失效。这不仅是由于传统帝国主义的破产和撤出殖民地,更是因为这些地理空间内的人口获得了主体性意识,并保留了对抗传统帝国主义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正如非洲最重要的反殖民运动领导人卡勃拉尔在1963年指出:

“关于我们敌人的本性和它同其他殖民主义力量不同的特性,我们具有数百年的经验。尽管我们的敌人是孤立的,但是我们绝不能忘记,他们拥有大大超过我们的摧毁力量,也绝不能忘记,他们得到其他非洲各国人民自由和进步的敌人的军事力量公开或秘密的援助和支持。为此,我们正在进行反对世界帝国主义的斗争。”(人民出版社,1964:16)

卡勃拉尔的讲话表明,尽管民族解放运动取得了历史性胜利,但帝国主义仍以各种新的形式存在并继续施加影响。更为重要的是,数百年的殖民经验帮助殖民地人口认清了敌人的本质,而这些历史和文化记忆在增强殖民地人口的主体性意识中起到了关键作用。这说明民族解放运动的深远意义不仅在于实现政治上的独立,更在于心理和文化上的觉醒,以及反抗精神的延续。正因如此,国际团结在对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变得不仅必要而且可能。

随着传统帝国主义的终结，一种新的帝国主义取而代之。不同于前者直接和暴力的征服，后者通过间接手段和隐性机制来维护和扩大其全球霸权，从而形成了一种更为复杂的全球权力结构。特别是，当代帝国主义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特征的“人口”——这些“人口”经历了社会生产关系的变革和民族解放运动，具有高度的主体性意识，形式上享有主权国家和市场经济赋予的平等人格，并保留了集体抗争的历史记忆。因此，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征服与统治必须采取全新的方式，才能获得展开自身的基础和辩护。正如王金存（2008：108）在《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趋势》中指出：“传统帝国主义面对的是孤立无援、没有任何防御能力的个别国家或氏族，只要能占领一块殖民地并能维持其统治就够了；而当代帝国主义面对的则是各种类型的具有独立主权并在很大程度上联合起来的国家群体，它需要建立并维护一种令世界各国都承认并遵行的世界秩序和霸权”。也就是说，当代帝国主义的这种全新征服方式，首先需要获得上述新特征“人口”的“承认”，而不是唤醒他们历史记忆的对抗。

进入情境之中设身处地思考，这确实是一个十分吊诡的命题——作为帝国主义统治对象的一部分，“我”竟然承认并遵行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显然，这种“征服”形式必须彻底改变，才能在保有表面上公正合理的全球秩序的同时，持续推进隐性控制，并且获得“我”不自知的“承认”。这种看似不可能的“承认”只有在“征服”满足以下条件时才能实现。

首先，这种新的帝国主义对“我”的征服，必须以承认、肯定并利用“我”之独立平等人格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是因为“我”是市场经济、现代教育和政治变革的社会产物，开始更多地重视自身的声音、权利和价值。

其次，由于“我”生长在全球化时代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因此“我”之独立平等人格在客观上必然内嵌于当代帝国主义的复杂权力结构之中。这意味着“我”之独立平等人格无法完全识别所有隐性控制。这是因为当代帝国主义通过隐蔽的控制机制展开自身，如果“我”能完全识别和理解其全部权力操作，那么当代帝国主义也就不复存在了。在这一意义上，“我”之所谓独立平等人格只是形式上的或不完全的。换句话说，“我”虽然感到独立和平等，但实际上仍然受到帝国主义的安排和征服。

再次，这种双向承认机制——当代帝国主义承认“我”之独立平等人格，而“我”承认当代帝国主义的安排与征服——必然要以牺牲和让渡“他者”的利益为前提，否则帝国主义就无法展开自身^①。这是因为任何剥离控制和掠夺要素的行为主体都无法指涉帝国主义。“帝国主义”概念成立之依据就在于，从目标对象掠夺资源和利

^① 这里的“他者”指那些在当代帝国主义统治中被边缘化和剥夺利益的群体，而“我”则代表那些形式上享有独立和平等权利，但实际上仍被隐性控制和利用的人群。

益,以维护其全球统治和霸权(程恩富等,2019;谢富胜,2020)。

最后,当代帝国主义对“他者”利益的剥夺和控制必须是隐性的或非暴力的,否则就会引起“我”的同情,导致无法达成利用“我”之独立平等人格来否定“他者”的效果。因此,这种分化处置的征服,只有绕开“我”与“他者”共同继承的集体对抗传统帝国主义的历史记忆和文化才有可能实现。为了回避“历史”维度并利用“我”之独立平等人格,当代帝国主义对“我”和“他者”的安排,只有转向“现代”或“天赋的自然传统”的维度才有可能实现。也就是说,当代帝国主义的权力触角必须进入到当今世界关于科学与正义的叙事当中。

回到“人口”本身,不难发现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征服包含了两种策略——将“承认”和“否定”分别作用于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承认”其中一部分人口的价值,同时“否定”另一部分人口的利益。也就是说,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策略是对人口进行分化处置,而非传统意义上对整个地理空间内全部人口的全面占有与直接征服。亦即,一部分人口由于获得“承认”而主动接受征服与利用,另一部分人口因其被“否定”而被迫接受征服与利用。尽管方式不同,但他们最终都成了帝国主义展开自身的工具。这种策略不仅使当代帝国主义能够更加有效地控制被征服的人口,还使被征服人口由于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最终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尽管传统帝国主义有时也采用了分化处置人口的策略,比如扶植代理人政府与本土精英合作等,但这种分化处置通常是在实现对人口的直接征服之后,以分化作为一种统治策略;但是对当代帝国主义来说,分化处置(通常发生在对人口的征服之前)则是作为征服人口的充分必要条件,是它展开一系列后续更加隐秘的权力行动的起点。这种差异是理解传统帝国主义与当代帝国主义的重要基础。

如果说当代帝国主义的展开策略是对人口进行分化处置和双重征服,那么问题就在于,人口的不同组成部分原本是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的,因而共享着对抗传统帝国主义的历史记忆。因此,为了获得一部分人口的“承认”并以此“否定”另一部分人口,并避免这种集体记忆成为当代帝国主义征服人口的障碍,它必须寻找新的征服入口。我们由此可以看到,科学与正义是如何被利用和嫁接,进而与承认、否定、征服、反抗等要素缠绕在一起,共同构成了当代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运作架构。

(二) 一个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分析框架

本文所谓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运作,是指帝国主义通过各种手段,对被征服人口进行控制和利用的策略和机制。无论是传统帝国主义直接而暴力的征服,还是当代帝国主义的隐蔽控制和复杂结构,都是通过对人口的操作来实现其统治和掠夺目标。

图1展示了政治人口学视角的分析框架。从中可以看出,随着传统帝国主义向当代帝国主义的演变,对人口的征服模式变得更加复杂。通过这种运作模式的变化,帝国主义在当代社会中能够更加巧妙和隐蔽地布展权力和征服人口,从而进一步巩

固其全球霸权地位。下面,我们来逐一讨论这一分析框架的基本概念及其内在逻辑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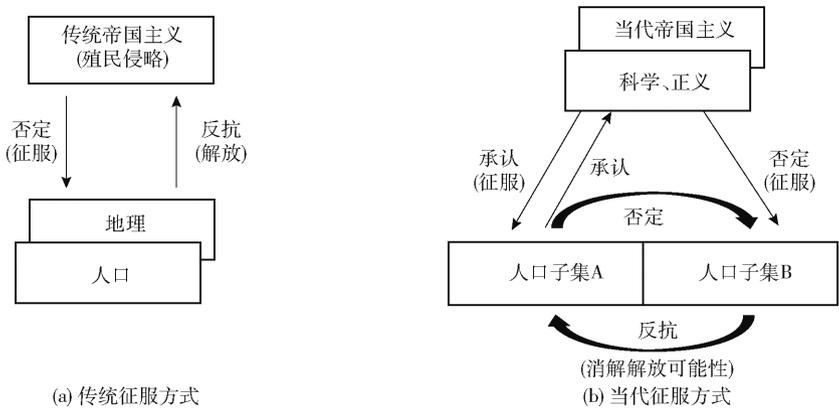


图1 传统帝国主义和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不同征服方式

注:第一个理论模型是个简化版本,省略了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存在但非决定因素的内容。例如,当疆域巨大或人口众多而难以一次性完全征服时,帝国主义可能会将领土分化为领土子集A和B处置,但其性质仍是整体“否定”领土子集A或B的人口,且其暴力军事行径使其易于被识别和遭到反抗,这与当代帝国主义存在根本区别。在第二个理论模型中,由于科学与正义具有强大合法性,因而尽管人口子集B是被科学与正义“否定”的对象,但却难以对抗这种被包装为客观和中立的权威。

1. 关于“人口”的定义

传统帝国主义是“从地理进入人口”,因而它征服的人口是与地理空间绑定在一起的,即通过殖民侵略与领土占领,直接征服、控制和剥削整个空间的全部人口。当代帝国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不再直接否定人口整体,而是对不同特征人口(比如人口子集A和B)进行差异化处置;其二,能够在不同地理空间内对具有相同特征的人口实施类似的征服策略(比如人口子集B可能是来自第三世界不同国家的工人阶级、移民或难民等)。这使其对人口的征服超越了空间约束,或者说与地理空间的关系发生了解绑,从而可以更有效地实现全球统治和剥削目标。显然,“人口”的定义在这里发生了变化。

(1)对传统帝国主义来说,“人口”是指在特定时点,一个国家、领土或地理区域内的所有居民,即与特定地理空间绑定的个体集合。

(2)对当代帝国主义来说,“人口”则是指以某种特征定义的、可以分化处置的个体集合。这种特征不限于地理空间属性,还可能来自生物、社会、文化、经济、政治等领域的规定。

2. 人口与“承认/否定”的关系

在传统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运作框架中,“承认”和“否定”与人口的地理身份

属性直接挂钩。帝国主义通过承认宗主国人口的身份合法性,同时否定殖民地人口的意义和价值,以此获得征服和统治殖民地人口的权力。

在当代帝国主义的框架下,尽管地理身份属性仍可能构成人口被承认或否定的理由,但其标准已不限于此。人口的某个特征是被承认还是被否定,由所谓的“科学”与“正义”来裁决——承认某些特征可能意味着赋予合法性,而否定则意味着剥夺和压迫,不同特征人口在权力结构中的地位因此而不同。

3. 人口与“科学/正义”的关系

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看,科学与正义之所以能为当代帝国主义布展权力和征服人口提供虚假合法性的辩护基础,原因在于资产阶级文明话语体系中的“人口”与“科学”和“正义”之间具有某种内在的契合性。

(1)人口。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2009c:505)。这是马克思对“人”的基本定义。按此定义,研究人口问题时,不能将“人口”视为一个抽象的整体,而是要从构成这个整体的各种社会关系因素入手,逐层剖析这些因素如何共同作用,进而塑造了人口的现实状况。正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指出:“抛开构成人口的阶级,人口就是一个抽象。如果我不知道这些阶级所依据的因素,如雇佣劳动、资本等等,阶级又是一句空话……资本,如果没有雇佣劳动、价值、货币、价格等等,它就什么也不是”(马克思,恩格斯,2009a:24)。因此,剖析人口问题必须在丰富的规定和关系中,寻求多样性的统一。然而,资产阶级文明话语体系往往忽视了人是社会关系的存在,从而无法看到人口不只是个体的数字集合,更是社会关系和历史过程的产物。人口问题由此被简化为一个数量问题,人口变为了可以通过数据和统计手段加以控制和管理的对象。这种处理方式遮蔽了资本雇佣劳动关系的剥削实质和阶级矛盾,最终不仅掩盖了资本主义的真实运作方式,还使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征服变得更加隐蔽和复杂。

(2)科学。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创造出一个普遍利用自然属性和人的属性的体系,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马克思,恩格斯,2009a:90)。这一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不仅仅限于物质生产领域,也扩展到了知识生产与科学话语之中。在这一普遍有用性的体系之下,以统计学变量形式存在的“人口”成为知识技术与政治权力的交汇点(福柯,2018:135-137)。通过科学方法来收集和分析数据,知识技术不仅为资本主义生产服务,也成为政治权力在更广泛的层面上进行社会控制和人口管理的工具。基于对这一全球知识技术和政治权力的垄断,当代帝国主义得以进一步巩固其全球影响力。它不仅可以抑制地方性知识并将地方性实践边缘化,还能够通过对全球人口进行详细的监控、分类和管理,实现更为广泛和深远的控制。

(3)正义。在人口统计学中,“ $1+1=2$ ”之所以恒成立,就在于对个体进行了抽象性处理,即忽略了个体的具体背景、社会生活和文化环境的差异。因此,统计学意

义的“人口”在概念层次上对应的是抽象意义的“人”。资产阶级文明的“正义”理念,同样源自抽象的“人”。这种正义话语主要体现在资产阶级的法律与道德体系当中,其核心指向为“人权”。根据其人权理论,“人”是一种抽象的和超历史的普遍性存在。也就是撇开历史进程,把人的本质固定为一种独立于社会历史的东西,即“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纯粹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马克思,恩格斯,2009c:505)。然而,人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产物,抽象的人并不存在。同样,人权的内容和实现方式也是具体的和历史的,抽象的人权也不存在。但帝国主义通过宣扬“推广正义”和“保护人权”为其对外扩张和统治提供合法性,本质上是通过普世主义的伪装,掩盖其实际的政治经济利益,以达到剥削和征服的目的。

因此,基于对“人”的抽象性处理,资产阶级文明话语的人口与科学、正义之间的内在勾连为当代帝国主义展开自身提供了辩护基础和操作手段。也就是说,科学和正义被工具化,用来“承认”或“否定”特定人口的价值和权利,从而达到控制和支配的目的。这也解释了为何自诩为科学高地和全球警察的美国,是当今世界帝国主义的典型代表^①。

4. 人口与“征服”的关系

对传统帝国主义来说,“征服”主要是通过军事手段占领整个地理空间,进而对人口整体进行全面控制。也就是说,“征服”意味着占领、统治和剥削,征服形式是单一且暴力的。

对当代帝国主义而言,“征服”的内涵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征服不再是简单的占领统治,而是通过垄断科学和正义话语,以合法化和正当化的名义对目标人口进行分化处置。因此,除了“否定”和剥削,还出现了一种新的征服方式,即通过给予“承认”使被征服人口参与和配合帝国主义的运作,从而掩饰帝国主义行径的本质。这意味着“征服”不再仅仅是剥削,还包括通过“承认”来获得合作,使被征服的人口在某种程度上自觉成为帝国主义运作的一部分。应该说,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方式,不仅重新定义了要征服的“人口”,而且重新定义了“征服”本身的意涵。

5. 人口与“解放”的关系

传统帝国主义通过殖民侵略来实现对人口的征服。殖民和侵略具有高度辨识性,因此容易被识别,二者在概念上几乎没有明确界限。然而,当代帝国主义通过“科学”和“正义”的话语叙事来布展权力并实现对人口的征服。由于科学与正义被赋予了客观性、中立性和普遍性的价值,在现代社会中享有强大的合法性,人们很难将这些积极正面的概念与帝国主义联系在一起,从而难以识别出真正需要反抗的对象。

^① 例如,2003年,美国以反恐和推翻暴政为名入侵伊拉克,不仅摧毁了伊拉克的主权和政府结构,而且造成大量人口伤亡和基础设施破坏,伊拉克的经济和资源自主权丧失,当地人口生活质量大幅下降。

于是,挑战之处在于,在传统帝国主义框架下,被征服的人口能够直接识别、彻底拒绝并全面反抗殖民侵略;但在当代帝国主义框架下,被征服的人口不仅难以有效识别对手,即使意识到与科学和正义相关的话语权被帝国主义所垄断,也无法完全抛弃和直接对抗有关“科学”和“正义”的全部话语。此外,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分化人口的征服策略,利用人口内部的矛盾和分裂来维持其统治。这种策略使被征服的人口难以形成统一的反抗力量,从而大大消解了解放的可能性。

二、当代帝国主义人口政治学的具体运作:实证分析与案例研究

(一) 碳治理与当代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运作

当前,全球最受关注的气候议题无疑是碳治理。碳治理从表面上看似乎只是气候科学和环境保护的议题,但其背后实际上隐藏着当代帝国主义政治人口学的微妙运作。可以将这一现象称为“气候帝国主义”(climate imperialism)。尽管这种政治人口学最终操纵的对象是人口,但其叙事起点却并非直接指向人口,而是围绕生态危机和气候变化展开。气候变化主要由人类排放的温室气体引起,导致海平面上升、冰川融化、降雨模式变化以及极端天气频发。越来越多的科学证据表明,气候变化对人类健康、农业生产、社会稳定以及其他物种都具有毁灭性的影响(Pierrehumbert, 2019)。在这种背景下,有关碳治理的讨论越来越获得“生态正义”的辩护,并成为一个政治正确的话题。不仅联合国将“采取紧急行动应对气候变化及其影响”纳入可持续发展目标,而且全球各地对气候行动的广泛支持也反映了人类社会对可持续未来的共同追求(Vlasceanu et al., 2024)。

根据《巴黎协定》的要求,为了使全球变暖幅度控制在 1.5°C 以内,到2030年碳排放量需要减少45%,并在2050年实现净零排放^①。这一以数据形式设定的全球气候治理目标的实现,无疑涉及每个国家和人口的具体减排任务,包括这些任务是如何制定的,支持这些减排目标实现的技术来源以及各国之间不同碳减排任务量的交易问题。于是,人口在碳治理过程中扮演的不同角色,包括人口的行为、生产和消费模式等,都成为碳排放数据的一部分,并被用来衡量和管理。碳治理因此被“数据化”(datafication),即碳排放问题的提出、分析和处理都通过与人口相关的数据分析和管理工作来完成。

值得注意的是,气候问题最初是作为全人类共同面对的社会议题提出的,然而在全人类共同应对这项议题的过程中,“人类”的概念在无形之中被替换成了“人口”,并且“人口”在这里被进一步分化处置。也就是说,在气候行动的叙事中,有关全球碳排放的问题被逐渐引向特定国家、民族或某种特征人口的生产和消费方式。于是,

^① The Paris agreement, <https://www.un.org/en/climatechange/paris-agreement>.

从生态正义的人类道德高度出发,针对特定人口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提出干预性要求的政治人口学运作便开始出现了。要揭穿气候帝国主义在碳治理上的“人口—权力”关系,应当从揭露其有关科学和正义叙事的抽象性和虚假性入手,进而深入分析这些叙事如何被用来巩固不平等的国际社会权力结构。

1. 科学数据为什么可能远离真相？

气候帝国主义往往利用科学数据来呈现气候问题。然而,这种忽视历史性和现实性的科学叙事,虽然表面上看似客观和中立,却掩盖了重要的现实差异,成为掩饰利益和权力操作的一种抽象构造。比如,智利和阿根廷人口因其高碳排放强度的反刍动物肉制品消费受到指责,并被告诫需要推广以植物为基础的非乳制品饮食方式(Kim et al., 2020)。相比之下,针对高消费高排放的发达资本主义生活方式的批评则显得不足。事实上,美国推荐饮食方式的年人均温室气体排放量高达 1 579 千克,印度的这一数字仅为 700 千克(Chen, 2022)。然而,针对美国等发达国家生活方式的系统性批评和调整方案在国际气候治理讨论中显得不足,反而更倾向于将焦点放在发展中国家的消费行为上,反映了帝国主义在气候治理讨论中的不公平和双重标准。

这种不公平的气候叙事不仅在饮食建议上有所体现,而且在碳排放数据的选择性呈现中更加明显。以美国环境保护署提供的各国碳排放数据为例,按总量口径计算,排名前三的国家分别是中国(30%)、美国(15%)和欧盟(9%)(Chen, 2022)。然而,从人均碳排放量来看,2020 年美国的人均消费排放为 15.5 吨、人均生产排放为 14.0 吨,而中国的相应数字仅为 7.7 吨和 7.0 吨,相当于美国的一半水平。更重要的是,从工业革命开始到 2021 年,美国、英国和欧盟 27 国人口的累计碳排放量之和占全球总量的 46%。这意味着,几乎一半的碳排放量由这些发达国家贡献^①。事实上,通过进出口贸易调整碳排放量,第三世界制造业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还将进一步降低,而西方国家的人均碳排放量将大幅增加,揭示其更大的碳排放责任。然而,通过选择性地展示碳数据,发展中国家被描绘成了气候问题的主要责任方。这揭示了在国际气候变化谈判中,气候帝国主义如何通过操控数据和叙事,转移责任并强化自己的谈判地位,从而加剧发展中国家遭受到的不公平待遇。换句话说,由于科学数据的使用和传播与话语权捆绑在一起,其可能远离了事实的真相。

2. 生态正义为什么可能是虚伪的？

生态正义叙事通常以普遍的生态伦理为基础,强调全球共同的生态责任。然而,这种叙事往往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和视角为中心,成为气候帝国主义推行其隐秘意图和利益操作的工具,从而暴露出虚伪性。

一种常见的资产阶级的马尔萨斯主义观点,将当前消费和生产方式导致的陆地

^① The Global Carbon Project's fossil CO₂ emissions dataset, <https://zenodo.org/records/14106218>.

和水生生态系统退化、水资源枯竭及气候变化归咎于全球 80 亿人口的养活需求。因此,人口规模特征经常被错误地视为气候变化的主要原因。这种观点不仅分散了公众对实际碳排放主要来源的关注,还转移了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高碳排放生活和生产方式的关注。根据《气候平等:为 99% 的人而生的星球》报告,2019 年,全球最富有的 1% 人口(约 7 700 万人)产生的消费排放量占全球总排放的 16%,超过了所有汽车和道路交通的排放量。最富有的 10% 人口则贡献了全球一半的排放量。余下 99% 的人口需要大约 1 500 年的时间才能产生与最富有的亿万富翁同等数量的一年碳排放。预计到 2030 年,最富有的 1% 人口的碳排放量将是巴黎协议设定的 1.5℃ 目标所允许水平的 22 倍^①。然而,尽管世界上最富有的 10% 的人口贡献了全球变暖年排放量的 50%,一个极其不公正的现实是,气候变化的影响正极不成比例地落在对这个问题贡献最小的人口身上。

再如,非洲的人口高贫困率和快速增长,加之未来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严重影响,常被帝国主义视为全球社会和生态系统不稳定的象征。这种观点反映了帝国主义的文化中心主义立场。这种立场忽视了非洲社区在应对环境挑战方面展现出的独特韧性和适应能力,而将这些地区的困难简化为负面的象征,进而贬低了非洲的知识体系和应对策略。事实上,研究发现,非洲社区和当地人口在适应生态和社会挑战方面表现出的韧性和独创性,可能为人类世的可持续性生活和资源管理提供开创性的见解,并因此挑战长期以来支配其发展方向的帝国主义做法(Hoag & Svenning, 2017)。总之,尽管生态正义叙事基于全球共同的生态责任和可持续发展,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但实际上,这一叙事常被帝国主义所操控。此种操控不仅侵害了弱势群体的权益,还误导了对生态挑战的真实理解,甚至对那些在应对生态和社会挑战中展现出韧性与创新的地方性社区进行污名化。

3. 被制造出来的“承认”与“否定”

气候帝国主义通过“气候科学—生态正义”叙事,对不同特征人口实施“承认”和“否定”的分化策略,以实现其布展权力和征服人口的目标。气候帝国主义利用其国际话语霸权,通过选择性地展示和解释与人口相关的数据,对不同特征的人口进行“承认”或“否定”的分化处理。一方面,通过展示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数据,将资产阶级塑造成人道主义或发展领域的领导者,使其获得国际社会的积极“承认”并增强其在全球气候领域的话语权;另一方面,通过“否定”某些国家或民族的社会人口学特征(比如高生育率、低教育水平、反刍动物肉制品饮食习惯),加剧这些群体的边缘化,使其在国际舆论和政策制定中处于不利地位。

此外,这种科学与正义叙事还可能通过简单“否定”地方性知识的价值,进而破坏当地人口的生存和发展权益。一个例子是粮食生产。当前,粮食生产造成了全球

^① Climate equality: a planet for the 99%, <https://doi.org/10.21201/2023.000001>。

温室气体排放量的1/4,减少粮食生产的排放被认为是人类未来几十年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然而,农业生产是多样性的。数据显示,全球有超过5.7亿个农场,这些农场分布在各种气候和土壤条件下,采用截然不同的农艺方法;农场平均规模从孟加拉国的0.5公顷到澳大利亚的3000公顷不等;尽管全球食物热量的一半来自四种主要作物,但种子库中记录了超过200万种不同的品种(Poore & Nemecek, 2018)。因此,任何否定地方性知识并试图推广统一和标准化操作的做法,都有可能削弱全球南方社区的自主发展能力。例如,“乌贾马村落化”计划受到美国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影响,要求将超过500万人迁移到所谓“改良”的村庄,推广由美国主导的农业生产模式。然而,这一计划最终以巨大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告终。事实上,殖民主义的解决方案往往是不明智的,受刻板印象或外部强加的不恰当的“科学”驱动,甚至具有破坏性(Hoag & Svenning, 2017)。

4. “气候科学—生态正义”叙事下被征服人口的“反抗”

气候帝国主义利用气候科学与生态正义叙事,制造不适当的“承认”和“否定”,对不同特征的人口进行分类处置,以确定谁应该对碳排放负主要责任。在此过程中,一套“科学—正义”的综合话语消解了“反抗”的合法性和可能性。传统帝国主义“从地理进入人口”的征服方式,容易遭遇反抗和革命;而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方式,在气候科学话语的包裹下,上升到生态正义的高度,反而消解了抵抗的合法性和可能性。正是在这个综合话语中,帝国主义获得了展开自身的基础和辩护,在扩大其影响力过程中掩盖了其对人口的控制、管理和利用。

可怕的是,当我们越是诉诸“科学—正义”话语,人口就越容易成为一种被控制的客体;当我们越是使用与人相关的统计数据进行全球治理,气候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安排与征服就越可能以一种宏观层面的权力技术学方式实现。正如玻利维亚总统路易斯·阿尔塞所担忧的那样,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联合国系统和其他国际机制向历史上被殖民的国家强加规则,导致这些国家在经济发展中被边缘化。他认为,国际谈判和权力矩阵正是通过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叙述来施加影响的,这种“新碳殖民主义”进一步加剧了不平等(Sultana, 2022)。确实如此,在当前全球的气候治理框架下,气候科学与生态正义的叙事成了新的殖民工具,掩盖了实际的权力运作,并进一步削弱了被征服人口的反抗能力。

(二) 其他案例与进一步说明

如果说碳治理是当代帝国主义在气候层面操纵人口的一个实例,那么这种权力运作实际上渗透到了宗教、种族、政治、健康、性别和劳动等各个领域。这些实例共同揭示了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分化、控制和管理人口以巩固其全球霸权的复杂方式。

比如,在新冠疫情期间,“污名化”作为帝国主义政治人口学的运作手段,揭示了全球权力结构中的系统性不平等。通过掌握国际话语权,西方帝国主义利用传染病学和流行病学等科学证据控制疾病叙事,将新冠病毒的起源和传播责任归咎于

特定国家或人口,并通过夸大某些国家的疫情数据或传播风险,制造全球性的恐慌和偏见,使这些国家和人口在国际社会中处于不利地位。这种策略不仅转移了公众对自身公共卫生失败的关注,还进一步强化了对特定国家或人口的污名化(Lin & Wang, 2023)。在此基础上,利用“生命正义”叙事,以全球健康危机作为借口,对特定国家实施经济和政治制裁,进一步削弱这些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基础。正是通过这种复杂的跨国界权力操作和多层次的叙事控制,当代帝国主义利用“健康科学—生命正义”来制造和维持污名化,从而实现对不同人口的控制和管理,以维护和巩固自身在全球公共卫生事务中的霸权和主导地位。

再如,全球服装业中女性工人的剥削状况也是一个典型案例。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全球化进程,将生产环节外包至工资水平极低的发展中国家。这种分化操作使得发达国家的资产阶级能够在发展中国家剥削廉价劳动力,特别是女性工人。据统计,全球工资水平最低的埃塞俄比亚服装女工的工资水平只有26美元/月,远低于470美元/月的全球服装制造工人的平均工资水平;而作为最大的服装出口国之一,孟加拉国将近90%的服装制造工人是女性,但其工资水平却不到55美元/月,远远无法覆盖生活必需品的消费需求^①。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全球供应链的层层外包,不仅隐藏了剥削的直接责任,而且通过复杂的国际贸易和法律框架,使女工难以获得法律和社会保护。与此同时,西方发达国家的女性主义“精英”在时尚产业中获得高度认可,被视为引领潮流的先锋。然而,这种“承认”是以“否定”第三世界服装女工的生命体验为代价的。换言之,女性主义“精英”的成功部分建立在这种不平等的全球生产链上,却被用来证明资本主义的正当性和优越性。由于西方女性主义精英和第三世界服装女工在人口权力结构中的角色不同,两者之间形成了对立。这也进一步导致了全球北方的女性主义(通常强调法律平等、性别中立和经济自主)与全球南方的女性主义(通常关注集体价值和社区问题)在女性解放目标和方法上的差异。这种内部分裂不仅削弱了妇女运动的变革潜力,也削弱了她们反抗资本主义剥削和挑战当代帝国主义的力量(Lin & Wang, 2023)。可以说,时尚产业中的性别叙事和全球生产链中的劳动力剥削相互交织,揭示了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深度勾结。

最后举一个大卫·哈维在《新帝国主义》中提到的例子。1997年,对冲基金对泰国和印度尼西亚货币的攻击,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它们实行严格的紧缩政策,导致整个东亚和东南亚地区陷入金融危机,企业大量倒闭,成千上万的人失业陷入贫困。这场危机还大大提升了美元的地位,巩固了华尔街的主导地位,并显著增加了美国富裕阶层的资产价值。阶级斗争开始围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加的结构调整、金融资本的掠夺性行为以及私有化带来的权利缺失等问题展开。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

^① Global apparel & textile trade and sourcing, <https://shenglufashion.com/2020/12/04/minimum-wage-level-for-garment-workers-in-the-world-updated-in-december-2020/>。

逐渐转向抵抗主要的金融化机构,尤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哈维,2009:55)。当代帝国主义通过操控国际金融机构,对全球不同经济体进行分化、控制和管理,借助经济学的合法性话语,将反抗力量引向错误的目标,从而削弱了真正的解放可能性。

不难看出,“人口”概念的分类使用已遍布各个领域,碳排放和气候行动、疫情防控与公共卫生、服装生产与时尚文化、金融监管与经济制裁等等,这些看似毫无关联的事物,共同指向了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微妙运作和隐蔽征服。在碳排放和气候行动中,特定国家或地区的人口被视为“高排放者”,从而成为国际社会制裁的对象;在疫情防控中,某些人口群体被污名化,导致了不平等的公共卫生措施;在时尚文化中,第三世界服装工人的劳动力被剥削,而西方时尚精英却获得了高度的社会认可;在全球金融体系中,被压迫国家的劳动人民被迫接受紧缩政策,导致福利削减、大量人口失业,社会不平等加剧。通过这种分类和操作,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不仅在物质层面加强了对全球资源和劳动力的控制,还在意识形态层面塑造了社会对不同特征人口的认知模式。这种操作使得不平等的权力结构在全球范围内得以巩固和延续。也因此,当我们越是“否定”人口的某种特征或者“否定”某种特征的人口群体,就越可能在无意识中接受和传播不平等的权力结构。

事实上,我们日常生活中的概念都可能成为“人口”在现实社会中被处理和分类操作的标准。在全球化时代,一切要素——年龄、性别、生产、消费、种族、家庭、健康、职业、文化、宗教、生态等等——都可能被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这些标签化的特征在资本主义系统中被放大和利用,成为当代帝国主义征服人口的重要工具。这种政治人口学的核心运作在于,将一个具有主体性意识并保留集体对抗殖民主义历史记忆的“人口”,改造为一个便于分化处置的“人口”。在此过程中,通过科学与正义叙事等方式的意识形态传播,当代帝国主义使这些标签和分类在社会中被广泛接受和内化,从而制造和加剧人口内部的分裂与矛盾,削弱其集体意识和抵抗能力,最终实现对人口的安排和征服。

三、迈向当代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批判

(一)重新理解人、人口与当代帝国主义的关系

当我们主张当代帝国主义通过复杂而隐蔽的方式展开自身时,这一观点容易被接受,因为它反映了当前学术界的基本立场和共识。然而,当我们主张日常生活中的各种要素可能因被纳入资本主义系统而与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分化处置和征服控制产生内在联系时,这一观点不由得让我们产生疑问:难道“我”生活在帝国主义对“我”的安排之下而不自知吗?毕竟,这一主张如果成立,就意味着老年人、残疾人、妇女、Covid-19痊愈者、数字公民、第三世界劳工以及灾后重建人口等不同特征的人

口群体(自然也包括“我”在内),均有可能成为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对象。

确实,将许多看似毫不相关的人口群体与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联系在一起,挑战了我们的想象。例如,老年人——通常作为生命科学、神经科学、老年医学、社会保障学、公共管理学、心理学、教育学等学科的言说对象——竟然也可能成为当代帝国主义的征服对象?如果这种可能性成立,就意味着当代帝国主义的渗透方式之隐秘和强大,以至于不仅使老年人难以察觉到自己被纳入了一个更大的控制系统,也超出了作为“事外人”和“观察者”的“我”的想象。这种复杂性和隐蔽性使得当代帝国主义不仅能够在全球范围内有效运作,而且已然交织成一个复杂网络,在不知不觉中影响和操控着各类人口群体。

然而,在笔者看来,与其说这些观察和讨论超出了我们的直觉和想象,不如说我们是在依赖学界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既有理解,从而抹杀了其全部的可能性。直言之,现有研究虽然认识到当代帝国主义通过更隐蔽和复杂的方式进行控制和管理,但是这些分析往往集中于那些显而易见的被压迫对象,例如被跨国公司掠夺资源的土著农民、被种族主义政策压迫的难民以及被新殖民主义剥削的非洲人口。然而,它们往往忽视了当代帝国主义对“不可见”群体的控制和管理。换句话说,学界对当代帝国主义的理解主要表现出两个特征:其一,征服对象是显性的;其二,征服方式是隐性的。因此,这种理解仍然在很大程度上基于对传统帝国主义的延续和变形,是对“看得见征服对象”的当代帝国主义(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with visible targets)的批判。问题在于,要全面理解当代帝国主义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就不能忽视那些看不见的或者未被意识到的潜在征服对象。只有进一步探讨当代帝国主义的隐性的和潜在的征服机制,才能更准确地揭示其全貌,并找到有效的反抗策略。

根据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2009b;470-471)。我们生活在一个由时间、空间、确定性、不确定性、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等不同因素共同编织而成的世界中。历史境遇、空间位置、种族身份、突发疫情、制度变迁、技术发明……这些要素的组合诞生了各种不同特征的人口。对当代帝国主义来说,那个可以被征服的“人口”恰恰是指以某种特征定义的、可以分化处置的个体集合。而这些特征的赋予既可能来自确定性、结构性和看得见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定,也可能来自不确定性、非结构性和看不见的时间和空间的规定。因此,“特征”的价值和意义对我们来说,可以自发形成,比如新的社会运动和技术发展带来的新社会角色和文化认同;也可能被强制赋予,在特定的权力关系和社会结构下由外部规范塑造;还可能在生成之中,随着历史进程的自然演变而形成新的文化特征、社会角色或经济行为模式。此外,由于历史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旧特征在新的社会条件和力量对抗下还会逐步消亡。

无论如何,人总是带着某种特征向另一种特征走去,直至生命终结。既然“我”生活在各种“特征”之中,而这些特征并非总能被“我”感知或意识到,那么就不得不承认,每个人都有可能在特定的情境下被划入某一特征人口群体之中,从而成为被“否定”的对象。这是因为特征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导致“承认”与“否定”之间的界限变得模糊和动态。一个人在某个领域或属性上可能被“承认”,但在另一个时间或空间中,可能会被“否定”。更进一步,历史的“我”也有可能否定未来的“我”。换句话说,“我”与自身的历史联系可能会被随时地切割或者被利用。我们因此被推向了一个无处安放自身的身份认同体系之中。

于是,这种流动的“特征”及其带来的动态“承认”与“否定”,为当代帝国主义实时征服不同的“人口”——那个包罗了不同特征属性并处在不断生成过程中的“人口”——提供了操作的可能性空间。这种操作并不是通过显性的、直接的手段进行,而是通过隐蔽和复杂的机制,将个体不断地纳入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集合中,并在不同的情境下对其进行“承认”或“否定”。于是联想到“后马克思主义者”拉克劳和墨菲提出的一个概念:“漂移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拉克劳,墨菲,2003:126)。换句话说,“人口”在这里表现为一种“漂移的能指”,即虽然需要由某个现实的人群来填充,但并不会固定在任何特定的人群上。事实上,所谓的“人口”只是将某种特征附加在个体身上而形成的权力关系的产物。从这个意义上讲,任何人群都可以通过这种“连接”构成一个“人口”。这种征服机制的可怕之处由此被揭示出来了:尽管当代帝国主义所征服的“人口”是具有某种共同特征的个体集合,但是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个体”,我们可能在没有意识到这种征服的形式和存在时,就已经身处被征服的境遇之中了。因此,当代帝国主义并非通过强制性手段来实现对人口的征服,而是通过一种复杂的、看似自然的过程,使个体逐渐成为其意图的受制者。在这张无形网格之中,个体的自我认知和身份认同不断被重构,使得我们在不同情境下的角色和地位变得易于操控。这种难以识别和反抗的特性,使得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征服更加牢固和难以动摇。

总而言之,当代帝国主义的直接征服对象是具有不同特征的“人口”,而其潜在的征服对象是处于时间、空间、确定性、不确定性、结构性和非结构性多重张力中的每一个人。可以说,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微妙控制机制,通过特征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不仅挑战了我们对身份和主体性的传统理解,也促使我们重新审视个体、人口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因此,从政治人口学角度来看,我们需要对“当代帝国主义”进行重新定义:通过隐蔽和复杂的手段,对不同特征的人口进行分化、控制和管理,同时潜在地征服每一个处于随机游走和历史张力中的个体,以维护其全球霸权的权力体系。

(二) 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政治人口学批判

笔者在上文的分析中,对“帝国主义”“人口”“科学”“正义”“承认”“否定”“征

服”“反抗”等关键范畴进行了重新解读甚至定义,并强调了这些范畴之间的内在联系。现有研究通常只比较分析传统帝国主义与当代帝国主义的内涵差异。然而,从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来看,历史性范畴只有在整体性视域中才能获得自身的合法性和概念的自足性。因此,预设一个单一范畴变化的理论模型是不正确的。我们应该在整体性的历史过程中对这些关键范畴进行统一定义和重新理解。

这也意味着对当代帝国主义政治人口学运作机制的反抗,必须采取整体性的方式,而不能只针对单一方面进行攻击。正因如此,当我们面对当代帝国主义时,必须具备一种全面且彻底的理论勇气。这种勇气应当指向从整体性视域和历史性角度推翻整个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框架。换句话说,对当代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批判,绝不仅仅是为了提供一种表层的回应,或是在帝国主义运作框架内讨论如何反抗帝国主义,而是要彻底抛弃这一运作框架。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视角的批判思路。

第一,关于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解释。列宁(1990:437)认为,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其内在矛盾和外部矛盾都进一步加剧,使得资本主义制度的崩溃和无产阶级革命的发生更为可能。然而,资本主义并没有如列宁预言那般迅速走向灭亡。以往学界在解释这一现象时,通常从资本主义系统的调节和适应能力(比如国家干预、社会福利制度、地缘政治策略、意识形态渗透)、苏联模式的失败以及帝国主义的变形等角度进行分析(赵曜,2002;张一兵,2024)。然而,这些解释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对“人口”变量的考察。我们认为,对人口的安排和征服是当代帝国主义的重要运作机制,在解释资本主义如何延缓自身危机和避免迅速崩溃方面,需要得到重视。当代帝国主义通过政治人口学运作,将科学与正义、承认与否定、人口的分化处置、征服与反抗等元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复杂的“人口—权力”关系。这一过程通过分化、控制和管理不同特征的人口,在一定程度上分裂并消解了反抗帝国主义的力量,从而强化了全球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机制,使资本主义不仅维持了自身的存续,还强化了其全球霸权。这种复杂的政治人口学运作机制,是理解当代资本主义“垂而不死”的关键因素之一。

第二,从马克思主义角度看,不论是传统帝国主义还是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定义,都是将其看作物化的对象。传统帝国主义认为殖民地人口质量低劣需要淘汰改造;当代帝国主义通过数据化等手段将人口作为可以操纵和利用的对象。相比之下,马克思主义强调人是社会关系的产物,揭示了资本主义压迫机制与人口的关系。这样的“人口”不仅是物化的客体,还可能因主体性意识觉醒而成为历史变革的主体。伴随帝国主义的转变,成长起来的力量也包括社会主义。在帝国主义的政治人口学中,“否定”对应的是“征服”,旨在维持和强化对人口的控制,延续其全球霸权。对于马克思主义来说,“否定”对应的是“解放”,即通过揭露和推翻不公正的权力结构实现社会主义,使被压迫人口获得真正的主体性和解放,因而这种“否定”的力量必然指向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而一旦实现了全部人口的解放,政治人口学也

就完成了其特定的历史使命，最终走向消亡。

第三，为了使“否定”因素从征服人口的力量转变为解放人口的力量，必须找到真正的科学与正义。从辩证法角度看，“科学”与“正义”总是与“否定”联系在一起。但是，它们既可能被用来强化压迫机制，也有可能在实践中揭示和批判权力结构的不平等，推动社会变革和进步。关键在于什么样的科学与正义，才能实现“否定”因素的解放功能。资产阶级文明的科学和正义，是服务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工具。也就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除了“普遍有用性”，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包括科学与正义（马克思，恩格斯，2009a:90）。相反，科学与正义被用来掩盖剥削、合法化控制、再生产不平等，从而巩固帝国主义的统治地位。也就是说，科学与正义被用来制造不恰当的“承认”与“否定”，使帝国主义能够定义什么是“问题”以及相应的“解决方案”，以维护自身利益。对马克思主义来说，科学应当指向解放性，揭示现实世界中的剥削关系和不平等结构；正义应当指向革命性，致力于消除这些不平等和压迫。只有这样的科学与正义，才能将“否定”从征服人口的力量转变为解放人口的力量，最终实现社会进步和人类解放。

第四，团结起来战胜帝国主义是人类社会的共同出路。当代帝国主义通过赋予“特征”重新定义“人口”，并利用这些特征在时间和空间上的流动性动态控制人口，从而使其手段更加隐蔽和难以识别。因此，面对当代帝国主义对人口的征服，没有任何个人、民族、国家或群体可以真正置身事外。这种“特征”的流动性和不确定性使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身份变得更加不稳定，随时可能遭到否定。正是因为当代帝国主义的潜在征服对象是每一个处在随机游走和历史张力中的个体，所以我们无法超然于帝国主义对他人的征服之外。这种征服不仅涉及他者，还深刻影响我们每个人的存在意义和自我认同，并在人类历史进程中不断生成新的矛盾，使我们的生命体验陷入持续的内部冲突之中。为了打破这种控制，我们需要新的革命性视角和策略。正如《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马克思，恩格斯，2009c:539）。在这种现实的运动中，我们需要不断揭示和反抗帝国主义对人口的隐蔽控制，以争取真正的自由和解放。

[参考文献]

程恩富，鲁保林，俞使超，2019. 论新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特性——以列宁的帝国主义理论为基础. 马克思主义研究(5):49-65

福柯，2018. 安全、领土与人口. 钱翰，陈晓径，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哈维，2009. 新帝国主义. 初立忠，沈晓雷，译.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拉克劳，墨菲，2003. 领导权与社会主义的策略——走向激进民主政治. 尹树广，鉴传今，译. 哈

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列宁,1990.列宁全集:第27卷.2版.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刘敬东,王淑娟,2015.破坏与重建:英国之于印度的双重使命——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印度个案.现代哲学(2):18-27

马克思,恩格斯,2009a.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9b.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恩格斯,2009c.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北京: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1964.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主义者关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言论.北京:人民出版社

王金存,2008.帝国主义历史的终结:当代帝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趋势.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谢富胜,2020.当代帝国主义研究的三种范式.马克思主义研究(11):130-142

张一兵,2024.当代资本主义为什么垂而不死?——列斐伏尔《资本主义的幸存》研究.求是学刊(1):44-59

赵曜,2002.资本主义在20世纪为什么能“死里逃生”和“转危为安”.马克思主义研究(1):37-41

Avilés-Vázquez, Katia R., Gustavo García-López, Carol E. Ramos-Gerena, et al., 2023. Environmental justice movements as movements for life and decolonization: experiences from Puerto Rico//Beatriz Bustos, Salvatore Engel-Di Mauro, Gustavo García-López, et al., eds. Routledge Handbook of Latin America and the Environment. London:Routledge

Chen, Ying, 2022. How has ecological imperialism persisted? A marxian critique of the western climate consensus. The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3):473-501

Hoag, Colin, Jens-Christian Svenning, 2017. African environmental change from the pleistocene to the anthropocene. Annual Review of Environment and Resources, 42:27-54

Kim, Brent F., Raychel E. Santo, Allysan P. Scatterday, et al., 2020. Country-specific dietary shifts to mitigate climate and water crise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62:101926

Lin, Jinlong, Yang Wang, 2023. Back to Marx: reflections on the feminist crisis at the crossroads of neoliberalism and neoconservatism.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Communications(1):1-10

Lin, Jinlong, Yukun Wang, 2023. Lessons from the stigma of COVID-19 survivors: a Marxist criticism appraisal. Frontiers in Public Health, 11:1156240

Pierrehumbert, Raymond, 2019. There is no Plan B for dealing with the climate crisis. Bulletin of the Atomic Scientists(5):215-221

Pitts, Jennifer, 2010. Political theory of empire and imperialism.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1):211-235

Poore, Joseph, Thomas Nemecek, 2018. Reducing food's environmental impacts through producers and consumers. *Science*(6392):987 – 992

Sultana, Farhana, 2022. The unbearable heaviness of climate coloniality. *Political Geography*, 99: 102638

Vlasceanu, Madalina. , Kimberly C. Doell, Joseph B. Bak-Coleman, et al. , 2024. Addressing climate change with behavioral science: a global intervention tournament in 63 countries. *Science Advances*(6): eadj5778

How Does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Conquer Populations?

—A Marxist Critique of Political Populogy

LIN Jinlong MU Guangzong

Abstract An imperialism that lacks the organization and conquest of populations cannot sustain itself.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not only redefines “population” but also rewrites the meaning of “conquest.” For traditional imperialism, “population” refers to all residents within a geographic space (e. g. , a country or region); for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population” refers to a collection of individuals defined by certain characteristics, which are not limited to geographic attributes. Traditional imperialist “conquest” meant occupation, domination, and exploitation, justifying itself through the direct “negation” of the value and significance of colonial populations. Contemporary imperialist “conquest” includes not only negation and exploitation but also “recognition,” making the conquered populations consciously part of the imperialist operation. The secret of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lies in its concealed and complex methods of differentiating, controlling, and managing populations with various characteristics, potentially conquering every individual caught in the random flux and historical tensions, while self-reinforcing and reproducing unequal power structures. This shift in the operational method of population-power dynamics has, to some extent, delayed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In the context of imperialist practices, “negation” corresponds to “conquest” and the perpetuation of global hegemony; for Marxism, “negation” means “liberation” and the realization of socialism. Once the liberation of all populations is achieved, population-power dynamics will cease to exist.

Keywords Contemporary imperialism; Capitalism; Population; Conquest; Marxism